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9月27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
向陈明平丽

【书里书外】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□钟倩

那天，从外面回来已是中午，突然窗外下起瓢泼大雨，且丝毫没有停的意思。我抱着手机发呆，不时点开看看附近外卖商家有营业的吗。这场大雨就像一位幽怨的贵族老妇人，把内心积攒的万千委屈和绞痛都一股脑儿倒个干净。我试图把脸贴在窗户上，仿佛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愤恨和哭泣，不禁想起阿赫玛托娃的诗句：必须性最终也屈服了\犹豫地\她自己躲闪到一旁。就这样，一个下午，又累又饿，案头上搁置的李修文的新书《诗来见我》与我相遇，读完了雨也停了，我竟然有种从大雨中狼狈奔走的恍惚感。那些文字如若初见，给我迎面一个拥抱。

莫言说过，读诗是为了更好地欣赏诗歌，而诗人杨炼则认为，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。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，诗歌本身就是时间，它终将安顿我们，尽管历尽劫难。李修文更为直接一些，他把“我的命”和“命的八字”放进诗歌里进行审视，在与元稹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韦应物、罗隐、杜甫等古人的重逢中尽情歌哭，又风雨兼程“在路上”把古人授意的慰藉拱手相让，温暖芸芸众生。不得不说，无常尘世间能让自己现“原形”，这不啻于一种自我剖析，需要十足的勇气；与此同时，他又以古典诗词的钩沉与文学积淀为现代人提供一种“与古人相遇”的契机，这样的解读实际上是生命感动生命，以生死鉴照精神人格。

李修文的文字，自带江湖草莽气息，最初我误读为义气，直到邂逅这本书，我看到了一种大的东西——是历经波折后的大痛切大悲悯大宽容。他始终在路上，四处改剧本，为了生计也为安顿灵魂，所遇之人皆是“微尘众”，泥瓦工马三斤、小镇做饭师傅、川西小镇开超市老周、疫情中的母女……很多人都没有名字，见得一个人的成住坏空、生死幻灭、爱恨情仇，我在想，他的“在路上”何尝不是我的“正发生”？就像我每次半夜疼痛发作，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，就像我经常感冒一把鼻涕一把泪仍抱着手机改稿子，与置身小镇上挨饿受冷的他殊途同归。但是，他总能在无望中看见一抹亮光，就像冥冥中伸手抓住一根绳索，渡自己成功上岸。

这根绳索，就是古诗词。他把驿站诗视作护身符，“每到驿亭先下马，循墙绕柱觅君诗”，“单单那些驿壁上的故人与陌生人之诗，就足以令我们像靠近了炉火一般，在瞬时里变得热烈起来”；他在绍兴沈园里替陆游追悔，“唯有来到沈园，一生抗金之志难酬的陆放翁才能提醒自己，你还别有一场仗要打，即，你活下去，唐婉才能在你的诗里活下去”，悔到极致触及生机；他在黄河渡口上遇见杜甫，“他就挤在人堆里，登上了最后一班渡船，我的鼻子酸了一下，但是又生怕他招呼我，让我跟他同路”，这让我想到女作家潘向黎的《杜

甫埋伏在中年等我》，当她读到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竟然流下眼泪，此时她的父亲去世已经多年，她才顿悟到父亲曾说的“老杜着实好”。相比之下，李修文少了儿女情长，而是在杜甫的诗中找寻来路，也是活路，可见人人都活在杜甫诗里。

知人知诗更知世，读人读诗更读心。驿站诗、贬谪诗、悼念诗、乐府诗……李修文与古人同歌哭，所以才会使人读出水深火热中的百般滋味，让我们在喧嚣而浮躁中暂且抽身，有种刚从农贸市场或夜市集市回来的躁动感，沾了一腿泥巴和人挤人的汗臭味，这就是生活烟火，这就是活着的证据。反过来回望那些散落的诗句，似乎是谜底，又恍若禅语，偶尔还是打诳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一说就破。我由此大悟，古诗词是古人留下的一封封情书，等待有情人拆启并句读，如果前面需要加上个期限，那么就是一生一世。

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《致母亲》。李修文在临睡前看到一则视频，一位女儿痛失母亲，他继而想到自己的母亲，觉得处处都站着母亲；又想到苏曼殊、李贺、李白、蒋士铨的母亲。读到这里让人有些哽咽，他没有直接揭示苦难，其感同身受全部氤氲在诗中：从白居易的“鹅乳养雏遗在水，鱼心想子变成鱗”，到蒋士铨的“寒衣针线密，家信墨痕新”，周寿昌的“重缝不忍轻移拆，上有慈亲旧线痕”，从李白的“老母与子别，呼天野草间”，苏轼的“岂似凡人但慈母，能令孝子作忠臣”……所有的骨肉离别之痛，都在诗里；诗是酒，诗也是药，独自吞咽，获得某种救赎。读完这些，我又有了像儿时那样大声诵读诗词的冲动，或许这就是作者的苦心孤诣。

记得评论家项静说过，“在今天，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‘正确’文学的通行证，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中国作家，满纸的小人物的辛酸史都被奉为座上宾，但这些小人物几乎普遍沾染了衰老的暮气，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。”李修文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到生活中去，到底层中去，无论是火车站、航空港、小镇上、黄河边，还是楼道里，在他人命运中借古诗词找到生命的皈依——又如作家黑陶的观点，“底层”和“平民”意识，是一个真正诗人的现实大地，是能够为他的生长无限提供能量的强劲血库。显而易见，他早已驾轻就熟，这种叙事策略因了感同身受给人以逼真感或真实的逼仄感，叫人置身其中，反观自身，远离了“正确文学”的刻板思维，也就更引人共鸣了。

李修文把诗词束扎随身携带，遇险滩急流，当做利器护身，遭断食饥荒，视作饱腹干粮，逢他人有难，拱手以诗慰藉……他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，得诗词润泽，受大地反哺，传精神薪火，以此为那些困境中的人们点亮一盏灯火。“任从人弃掷，自与我周旋”，是供养更是祈祷，这正是文化的生生不息。

【文艺观潮】

三涧溪村的女村官

□张天贻

从蒋子龙的小说《开拓者》中省委书记车篷宽，到张锐的小说《改革者》中领导干部徐枫，再到程树榛的报告文学《励精图治》中厂长官本言，这些领导者的形象塑造虽然带有某些不足，但改革创新、敢想敢干的特质是他们普遍具备的优秀品质。可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领导者的形象大多为当代男性，而鲜少有作家关注并塑造当代女性领导者。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，作家徐锦庚在《涧溪春晓》一书中带领我们认识了一位女村官。这位村官不仅思想独立、人格自立，还有一定的问题意识与政治头脑。在新的历史时期背景下，她面对席卷而来的变革潮流，披荆斩棘，不畏艰险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往无前、脱贫致富。她的出现丰富了女性的文学形象，打破文学作品中柔弱的女孩、纯洁的天使、妖艳的少妇、泼辣的媳妇、隐忍的母亲……等刻板印象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见招拆招、公平公正、勇于担当的基层女村官。学者张宏图评价其为“不按常规行事、不按套路出牌的当代‘李云龙式’的女村官”。

三涧溪村在作者徐锦庚看来是个“看似宁静，实则充满‘斗争’的地方”。这里由贫到富、由富转贫，经历了贫富交替的巨大变革，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具体目标，而高淑贞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事实上，徐锦庚塑造的女村官高淑贞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，更是代表了我国脱贫攻坚事业中女性力量。

自从到三涧溪村任职，高淑贞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清晨就在村里转悠，思考村里的发展方向，在她看来权当健身。她就这样一天天转悠，一天天思考，让村民一个个搬进高楼，乔迁新居，她坦言那是她的心血，也是她不断拼搏的动力。由此看来，脱贫攻坚事业中的女性力量十分强大。敢想敢干、勇于拼搏、不断奋斗、坚强刚毅也不再是男性领导者所特有的品质。

高淑贞因其在三涧溪村脱贫事业中亮眼表现，被《人民日报》评为“最美奋斗者”。高淑贞刚刚到任三涧溪村，决心彻查土地承包费这笔“糊涂账”，可真正实施起来，阻力不小。村民们一个个“哭穷”，让清账的难度大大增加。这笔账原本可以一笔勾销，但高淑贞几番思考，提出有协议的按协议执行，没协议的丈量土地面积，重新签订协议。以2005年为界限，以前拖欠的承包费，向村民公布账目，暂作挂账处理；自2006年1月起，承包费必须每年一交，逾期不交者，轻则断水断电，重则收回承包权。高

淑贞认为，挂账就是暂时不收回，但总有收回的那一天。村民欠村里的不能赖账，但为了村里修路做出让步的人家，该赔偿的经济损失，她也做到了公正处理。村里修路占了村民王三魁搭的猪圈，高淑贞不仅给他赔偿了一块沼气池，还重新找了一块集体闲置地给他养猪，真正做到了诚实、公正。高淑贞证明了一个基层领导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能动性，也正是这样诚实、公正的优秀品质，让三涧溪村摘了贫困的帽子，走向“后脱贫时代”的探索之路。

高淑贞这个人物，具备女性所独有的耐心细致、柔韧不屈、宽容大度。她在帮助张娴彩争取丈夫赔偿金的时候，敏锐地发现了婆婆刘玉凤和媳妇张娴彩的婆媳矛盾。在听到刘玉凤的哭诉后，高淑贞想帮着改善这对婆媳的关系。经过她的耐心劝导，婆媳俩的关系有所改善，再也没有听见婆婆数落媳妇。高淑贞不仅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展现了其细致耐心的一面，在处理村里的“三国演义”上她也展现了女性柔韧不屈的力量。高淑贞采用“逐个击破”的方式，一步步建设完成了一个正直纯粹的领导班子，帮着村里修了路，让村子的经济逐渐复苏。高淑贞担任村支书期间，曾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表示，“要发现别人的优点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只要从小扶正，也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即使犯过错的人，也不能轻视，要多关心、多爱护。”村里逆反心强又自暴自弃的年轻人，通过高淑贞的耐心教化，逐渐步入正轨，对高淑贞更是钦佩有加。就是这样一位耐心细致、柔韧不屈、宽容大度的基层女村官，在脱贫攻坚战中做出了突出贡献，让女性的力量在领导者的岗位上被大家看到。当女性卓越的领导力、诚实、公正的品质和惊人的意志力再次聚集到镁光灯下，让读者重新意识到女性力量的强大。

在作者徐锦庚的眼中，高淑贞是千千万万在基层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村官的代表，也是无数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的化身，更是脱贫攻坚战役中能打胜仗的冲锋战士。《涧溪春晓》不仅是一曲女性的颂歌，还是脱贫攻坚战胜利的号角，更是又一紧要课题的开端。事实上，徐锦庚在文中已提出“后脱贫时代”的来临，也让我们思考脱贫之后该如何发展。徐锦庚关注的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提出“满足精神需求、提升文明素养、优化生态环境、提高治理能力，具有强烈的前意识”也许是人民小康之后的发展道路。这也证明脱贫之后的乡村发展问题，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时代课题。